



发展

—— 社会与人

FAZHAN
SHEHUIYUREN

◎ 祝黄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展

—— 社会与人

FAZHAN
SHEHUIYUREN

◎ 祝黄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 社会与人/祝黄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04-4862-7

I. 发… II. 祝…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736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乔 堂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新空气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祝黄河，1955年7月出生，江西瑞昌人，法学博士，教授，现任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师范改革项目、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9项省级以上课题。出版理论专著2部，参编4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省级以上奖励14项，现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库，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目 录

第一部分 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观的生成与转换	(3)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15)
关于社会的协调发展	(26)
关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5)

第二部分 人的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代意义	(49)
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研究论纲	(59)
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70)
自由与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初探	(76)

第三部分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邓小平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的战略抉择	(109)
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的运用和深化	(1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伟大实践	(130)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本质	(145)
关于现阶段党员的数量、质量及战斗力的思考	(154)

第四部分 苏联、东欧研究

苏联、东欧演变的原因与教训	(159)
苏联究竟为何解体	(210)

第五部分 文化建设研究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217)
正确对待外来文化	(229)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41)
“五四”·传统·现代化	(254)

第六部分 哲学经济综合研究

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	(26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思考	(269)
生产力标准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275)
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	(283)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289)
后 记	(297)

第一部分 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观的生成与转换

社会发展问题近年来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不是偶然的。从理论价值方面来看，这一问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以其巨大的理论容量和广泛的交叉研究领域辐射着诸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未来学、科学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兴趣，由于各学科的背景和立足点不同，研究过程中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同，客观上开拓了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这些研究也激发了各学科的内在活力，找到了与时代、与现实联系的结合点，从而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从实践意义方面看，社会发展早已不是一国而是全球性的问题。1995年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列为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优先事项”。当我们前些年还在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问题，抨击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奉行片面的发展观带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犯罪、吸毒、色情、伦理困境等社会弊端时，仿佛一夜之间，我们突然发现，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已逼近了我们。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是从20世纪延伸到21世纪的最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不论是从空间范围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都会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凸显出来。

因此，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并期盼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观作为指导。本文正是通过对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解析，考察了其

形成的背景与条件，并通过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转化过程的揭示，阐述了新的社会发展观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一、理论的发端：发展 = 经济

任何理论的出现都离不开它所处的生成环境及人们的认识条件，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发展 = 经济”缘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在发展观上的反映。这种发展观把社会发展的进程片面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又片面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而在回答如何能使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时，人的地位、人的作用被忽视了，认为市场机制的自由调节可以自然地实现物质财富和经济的增长，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和发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增加过程，认为只要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就可以不断增加国家的物质财富，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发展。斯密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推崇者，主张淡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责任，他的发展观是一种崇尚市场自发性并且在实际上必然导致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西方早期的工业化之路正是这种发展理论的实践。

此后的新古典学派继承了斯密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同时建立了一种更加抽象的纯经济理论，论证了一种更为明显突出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其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价格机制在市场调节中的作用，认为价格和供求关系相互影响，从而实现供求平衡，这种供求平衡从微观扩展到宏观，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不仅和斯密的思想一样把人假设为经济，而且这种“人”被设想为独立的、无差别的、仅能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的机器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个性特征不见了，当然就更谈不上人的现实的感性

活动本身及对环境的改变能力。这种理论把经济发展看作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毫无关联的单纯运动。它孤立地、机械地运行，超时空亦超历史。显然，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也只能是经济的片面发展。

20 世纪初，特别是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使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受到严重打击，出现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宏观调控思想，并在实践中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凯恩斯的国家宏观调控思想局限在经济范围内，因此他的理论和模式中包含的发展仍然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

“发展 = 经济”的理论并没有就此打住，20 世纪 4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工业文明观”。这一发展观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般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二是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实力论”得到大力推崇，工业上的实力等同于军力、国力，成为千方百计争得的目标。军力、国力的增强，终于使一些国家的侵略野心膨胀，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近 300 年时间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观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负面影响，如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和短期行为，造成了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从而陷入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等困境中。这种发展观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关系。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社会发展的过程、形式、成果并不完全真正地为了人、属于人、有利于人，这也就失去了发展本身的目的和意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带来了人的异化，人同其本质分离。这种发展观引发了一系列诸如能源紧缺、环境破坏、社

会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这种发展观还造成了文化的分裂、人文精神的丧失。单纯的经济发展推崇物质利益的驱动，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主体中的文化因素不见了，甚至文化也蒙上了经济、市场的因素。社会发展中主体的素质提高被忽视了，社会发展的文化含量、人文品位被遗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泛滥，导致了个人和社会在思想道德文化观念上的断裂。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已愈来愈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焦虑。

二、理论的探索：发展 = 经济 + 社会

“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社会步入现代化。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被人为割裂与分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重重矛盾。

从自然方面看，社会发展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逐渐提高，随着人们追求物质功利目的观念日益膨胀，对自然资源的滥采滥用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益加剧，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如森林破坏、土壤沙化、能源紧缺、许多物种濒临灭绝等。全球变暖，酸雨出现，大气中臭氧层的受损预示着生态平衡的破坏。与人类对自然粗暴践踏结伴而来的必然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两者同步增长，并开始动摇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

从社会方面看，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造就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并使主体得到某些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与人关系的紧张乃至破裂。技术使现代社会畸形化，使得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社会对人的统治并行不悖，人成为技术社

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与消费的奴隶，陷于全面的异化之中。科学技术把社会变成一架庞大的机器，人只不过是消极被动地听命于这部机器的仆人，或者充当这部机器的零件，失去了生命的乐趣和个体的自由，成为马尔库塞所描写的单向度的人。

从人自身看，片面的发展观导致了人的本质丧失。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带来了人的精神贫困，社会畸形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人的畸形发展，人愈来愈丧失个性而走向平均化、标准化和普遍化。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功利化、经济化、商品化，缺少亲情与爱心、理解与信赖、交往与关怀。人的精神世界日益匮乏，人与人之间日益疏远。正如西方学者尖锐批评的：“经济条件毫不留情地使现代人变成了一个没有自由、没有信心、没有独立性的存在物，总之使人具有各种缺陷以至缺乏人性的那些品质。”^①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某些学者在批判、反思、总结传统的片面的发展模式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美国率先提出建立一种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发展=经济”的发展观受到第一次冲击。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深深忧虑，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提出了“增长极限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的极限，应该实行经济的“零增长”，以缓解人类今天和未来的矛盾。他们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呼吁停止科学的进步。尽管“增长极限论”所持的立场是悲观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过于极端，我们不能赞同，但他们跳开经济的角度，提出认识未来和发展的新角度，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70年代中期，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提出了他们的新经济学，又称生存经济学。他们同罗马俱乐部的

^①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相似之处在于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应予抛弃；与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不同的是，他们主张通过对生态的保护，使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所以，他们又把自己的发展观称作“持续发展观”。尽管发展的主题仍是经济，但是，他们已开始提出在重视与自然界协调和谐的同时，重视社会关系的改善，重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解决，提出了政治改革与社会参与的建议，甚至初步提出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持续发展观又被概括为“发展 = 经济 + 社会”。

与持续发展观相呼应，80年代初，政治学领域出现了绿色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绿色政治学主张维护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协调发展，生态政治学反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主张建立一种立足于人类利益和全球安全的新政治思维。此外，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等学派和理论观点纷纷出现，这不只使社会发展问题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也酝酿着社会发展观的重大突破。

三、理论的深化：发展 = 社会 + 人

经济增长论和工业文明观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增长极限论是未来学家提出来的，实力论和绿色政治学是政治学家提出来的。多学科介入为发展观的突破打下了基础。80年代前后，各国学者就发展观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大量的学术专著出现，各种发展理论相互碰撞、整合，这说明从传统发展观、发展模式向新发展观、发展模式的转变已成为当代具有全球性质的时代潮流。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厄瓜多尔举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这表明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问题，研究落后民族如何实现现代化问

题,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趋势。这对于以往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中心课题的研究方法,无疑是一种重大变革。也就在这次会议之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委托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撰写的《新发展观》一书问世。《新发展观》继承了持续发展观,又突破了持续发展观;既跳开了“发展=经济”的角度,也超越了经济与自然协调的角度,把“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观推进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佩鲁首先批判了发展观上传统的经济增长论,指出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认为经济发展不过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我们不能把本来是作为满足人的需要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的手段当作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把本来是发展表现在一个方面的内容当作了发展的实质。不能混淆目的与手段、实质与实质的表现两者的关系。此外,社会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因素,它还包括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非经济因素,诸如文化、环境、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日常生活趋向等常常是经济因素无法代替的。佩鲁甚至认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强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①

佩鲁非常强调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观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要求把发展问题放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要求赋予发展概念以更丰富的内涵。他认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着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②“在文化因素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①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都会无能为力的。”^① 他认为真正的发展观是充分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批评那种见物不见人，只谈经济不谈文化的观点：“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②

佩鲁明确地提出了人在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③ 佩鲁认为，发展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本身获得全面发展。“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④ 关注人的价值是佩鲁发展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人们又把他的综合发展观称为“发展 = 社会 + 人”的发展观。

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他们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把发展看作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的发展，具体地说，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学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因素。90年代以来，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又提出了应“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在发展观中的地位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

①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8 页。

② 同上书，第 165 页。

③ 同上书，第 175 页。

④ 同上。

四、理论的定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

进入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是，世界并不太平，民族矛盾、武装冲突、局部战争不断；某些大国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南北矛盾进一步扩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已不再可能完全由学术研究机构来承担，全球的问题要由全球来回答和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 年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 年召开了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 年又召开了世界发展首脑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

哥本哈根会议的最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中。《宣言》和《行动纲领》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议题”；“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会议的这些观点，既是对综合发展观、持续发展观的肯定，也有对综合发展观、持续发展观的突破。

应该指出，我国为新发展观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82 年全国人大五届第五次会议正式决定，把我国的五年计划名称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和指标，这意味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日益得到决策者的重视。从 1983 年到 1994 年，我国把社会发展的指数从“十大领域”扩大到“十三大类”至“十四大类”，从社会发展内容的三次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除社会发展的内容愈变愈具体、愈丰富以外，也愈来愈接近社会发展内容的本质——人。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我国就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